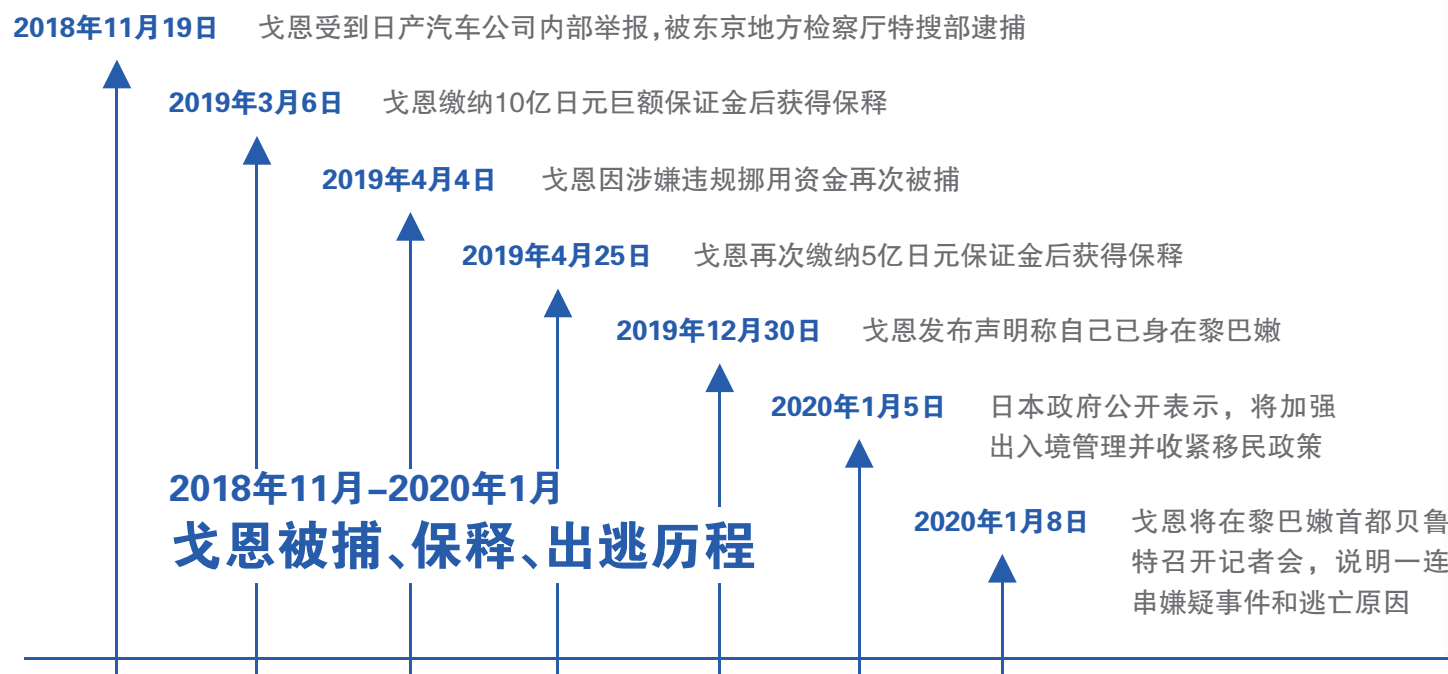


戈恩出逃谁之过

日产汽车公司前董事长卡洛斯·戈恩跑了已是事实，留下日本警方在风中凌乱。关于戈恩得以顺利“逃亡”的缘由，机场安检不到位也好，警方监视不认真也罢，抑或是有特种兵作帮凶，总之日本政府存在管理漏洞这一事实是跑不脱了。而在戈恩重获自由之后，黎巴嫩和法国方面态度微妙，日本警方越发被动起来。下一步的主动权，似乎掌握在了戈恩手上。



收紧离境程序

在戈恩逃离一周之后，日本政府终于首次作出了官方表态。当地时间5日，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表示，戈恩在保释期间离境显然是违法的，日本方面今后将加强人员的出境检查。

现年65岁的戈恩因违反日本《金融商品交易法》与《公司法》等罪名遭到起诉，于2018年11月19日在东京机场被日本检方逮捕。在经过了一年的保释被捕、再保释再被捕之后，戈恩筹划了令全球大跌眼镜的出逃。黎巴嫩时间2019年12月31日，黎巴嫩外交部以及戈恩本人发布的声明证实，他的确已经身在黎巴嫩。

这对于日本的司法程序而言，无疑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据悉，出逃时，戈恩仍处于保释期间，一直受到当局24小时的人力与视频严格监视，他所持有的法国、巴西和黎巴嫩护照均交由律师团保管，且未经允许不得与其黎巴嫩籍的妻子联络。事后日本出入境管理局表示，并未发现戈恩的出境记录，其律师团也称对其行踪一无所知且仍妥善保管着其护照。

此前，关于戈恩如何逃出日本的讨论甚嚣尘上。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，戈恩出逃的计划中有美国特种部队前成员的参与，他很可能是藏进了一个大尺寸的箱子里并被运上飞机离境。日本《产经新闻》则报道称，戈恩出逃是在日产汽车雇用的私人安保公司停止监视之后。此外，土耳其私人飞机运营商MNG公司3日宣布，已有一名员工承认伪造租赁记录帮助戈恩出逃。

而根据日本共同社5日的报道，私人喷气机是否需要安检交由航空公司及机长判断，关西机场相关人士指出：“大部分乘客拥有丰富的搭乘经验，因此安检很宽松”。日本《航空法》规定安检由执飞的航空公司负责实施，未按规定必须进行X光检查，因此戈恩有可能利用了安检薄弱的漏洞。

“打脸”日本司法

“这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嘲弄”，在戈恩出逃之后，日本多家媒体这样评论道。一位日本前检察官甚至表示，此事件“可能动摇日本的司法制度”。

一方面是戈恩出逃带出的诸多漏洞，从保释过程到监视系统，再到出入境管理，或许只要一个环节严防死守，便能拦下戈恩。日本读卖新闻反思称，戈恩逃亡之后，日本应加强国家司法制度的保释程序，为避免这种事再次发生，日本应该就如何弥补司法制度弱点一事进行讨论，例如根据涉案金额与被告资产等情况设置相应的保释金额，以及给被保释者佩戴定位监控设备等。

对此，森雅子表示，将对此事进行彻底调查，并表示当局已经发出了逮捕戈恩的国际通知。同时，法院已经撤销了戈恩的保释资格。至于保释制度，森雅子也承诺“会进一步综合各方信息，对完善保释制度进行讨论”。另外，日本检方发表了一份声明，为日本的司法体系辩护，称戈恩的离开无视法律体系，构成犯罪。

另一方面，伴随着戈恩的重获话语权，日本对其审判的正当与否也将公之于众。戈恩在逃亡后的声明中强调自己不是在逃避司法，而是在逃离不公和迫害，因为日本司法制度是以有罪为前提。戈恩在法国的代理律师Francois Zimeray称，戈恩出逃是因为对于受到公平审判完全丧失信心。他指出，虽然戈恩出逃违法，但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也没有维护法律的正当性。在法国，即使是恐怖分子，在审讯时也允许有律师陪同，但是日本不允许。

当然，于日本当局而言，更尴尬的问题在于，要想再次提审戈恩，可谓难上加难了。虽然国际刑警组织已经发出了“红色通缉令”，向世界各国警方提出请求，临时拘捕受到通缉的人员，以待采取引渡、投案或类似法律行动，但并不是逮捕令。而黎巴嫩法律禁止外国引渡其公民，因此戈恩如果留在黎巴嫩，不太可能被遣返回日本。

等待戈恩记者会

出逃只是戈恩的第一步，自证清白才是

重点。虽然逃离日本的过程多少有些仓皇，但对于被扣留了一年多的戈恩而言，这无疑是其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主动时刻。根据戈恩的公关负责人的说法，戈恩将于8日下午3点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召开记者会，预计他将在记者会上对一连串嫌疑事件和逃亡原因进行说明。如果此次记者会得以召开，将成为戈恩2018年11月被捕以来的首次记者会。

“现在大家都在等，等待戈恩的记者会。”汽车行业分析师贾新光表示，在最后一次被捕前戈恩就想开记者会了，但很快就再次被捕。可能这次戈恩开完记者会之后，事情会出现颠覆性的转折，所以日本方面其实是比较害怕的。

贾新光对北京商报记者分析称，戈恩被冤枉的可能性很大，日本一直有精密司法的特色。最早其实是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瞒报收入为由起诉戈恩的。但在戈恩同意支付罚款了结之后，日本方面却不太想放人，找了其他的理由，所以戈恩生气也就在于此。

事实上，这一年多来，几乎每次在戈恩的拘留期限快到时，东京警方都会对他进行“再逮捕”，这导致戈恩的拘留期限屡次延长。

2018年11月19日，戈恩在东京机场被逮捕。在20天拘留期限即将期满前，仍在拘留所的戈恩于12月4日和21日再次被捕。2019年3月5日，戈恩在缴纳10亿日元保释金后，第一次获得保释。一个月后，戈恩于4月4日因涉嫌违规挪用资金，再次被捕。之后戈恩又缴纳了5亿日元保释金，于4月25日再次获释。

矛盾点在于日产与雷诺的联盟。2017年，戈恩领导雷诺-日产-三菱联盟在轻型车领域获得了全球市场销量冠军，戈恩进一步的野心在于改变联盟格局，将三家企业进一步整合。雷诺是日产的最大股东，持有其43.4%的股份，但日产却只持有雷诺15%的股份，且无投票权。不对等的情况加上戈恩激进的行事风格，让日本方面的抵触情绪日益高涨。

贾新光坦言，日产方面现在有两种态度，一种是放弃联盟，另一种则是要求平等的合作，即换股。如果戈恩在记者会上反驳了所有指控，下一步就比较复杂了，日本方面将会很难收场，而一旦戈恩揭露了一些不利于日产汽车的事情，法国方面的态度也会强硬起来。

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

Focus

新官上任三把火 芬兰欲推“上四休三”

上任不到一个月，芬兰新总理桑娜·马林就将“上四休三”的新工作制提上了日程。这并非异想天开，以高福利著称的北欧国家早就考虑为民众减压。不过，革新工作制也会是一把双刃剑，带来福利的同时或许也将带来职业发展的阻碍。在“人性化”和“女性化”之间，桑娜·马林需要为这项新政找到平衡点。

灵活工作制

据英国《每日邮报》5日报道，马林呼吁在芬兰实行更灵活的工作制度，希望芬兰人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伴家人；我相信人们值得花更多时间去陪伴家人、爱人，花更多时间追求自己的爱好及生活的其他方面，比如文化”。马林所在的执政联盟要求在芬兰社会民主党成立120周年之际，为新的工作时间表进行一次试运行。

每周工作4天、每天工作6小时，马林提出的新政的确是一项革新。目前芬兰人民的正常工作时间与其他地区大致无二，每周5天，每天8小时。但自1996年通过《工作时间公约》后，芬兰一直采用灵活的工作模式，允许大多数雇员调整在工作场所的工作时间，可以提前三小时开始或晚三小时结束。

这不是马林第一次提出要缩短工作时长。在成为总理之前，马林曾担任芬兰交通部部长一职，彼时，她就呼吁过缩短工作时间，以改善雇主与员工之间的关系，提升工作效率。BBC曾于2017年报道过多个试行“上四休三”工作制的例子，得到的结果大都是员工幸福感得到提升、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均有提高。

对于马林这一深入人心的提议，民众自然一片叫好。芬兰教育部长、左翼联盟领导人李·安德松就对此表示支持：“让芬兰公民减少工作时长是很重要的。这与女性领导层的执政风格无关，而是给选民提供帮助，信守对选民的承诺”。

34岁就出任总理的马林，颇有些引人注目，除了全球最年轻现任总理、芬兰最年轻总理的身份之外，马林还是全球政坛上少有的女性面孔。除了新工作制的大胆提议之外，马林还提出过多项倡议。比如

在2020年1月1日的新年致辞中，马林就表示，对教育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，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改革芬兰的工业结构等。

缩短工时成风

事实上，马林并不是第一个提议缩短工作时长的人，毕竟在这一点上，芬兰的邻国瑞典起步超前了四年。早在2015年，瑞典哥德堡市的黑谷老年疗养院就开始了“6小时工作制”的社会试验，为了验证试验的效果，黑谷疗养院不远处的一家索兰根老年疗养院的护工则继续实行8小时工作制。

一年多过去以后，最后的试验结果显示，索兰根的护工请长期病假的比例是试验前的2.8倍，短病假的比例也上升了12.2%。相比起来，黑谷在这两方面的状况是分别减少了0.6%和50%以上。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当时瑞典全国各地甚至有不少地区都在蠢蠢欲动，欲跟进“6小时工作制”。

眼下，这种制度似乎有逐渐扩散的趋势。苏格兰新闻网站The National曾报道称，英国著名的肥皂制造公司Gracefruit创始人兼董事长伊丽莎·卡纳汉于2018年1月决定，该公司的员工每周工作23小时，同

时不会减少员工们的工资。

与马林的说法一样，卡纳汉表示，工人们很高兴减少了工作时间，可以有更多时间和家人一起从事各种休闲活动。此外，她还补充称，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并没有下降，营业额和利润都上升了，员工缺勤也越来越少。

如果Gracefruit还不够有说服力的话，微软就要出马了。去年8月，微软日本开始面向2300名正式员工试行“上四休三”的工作制度，去年末，微软日本公布了这一试验结果，数据显示，微软日本8月的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39.9%，92.1%的员工对“上四休三”表示满意。负责这种工作方式改革推进的主管人员甚至表示，打算今年夏天继续采取这种制度。

不一定是好事

对于缺乏劳动力的日本来说，用缩短工时的方式提升效率似乎成了一个不错的选择。《日经新闻》曾报道称，日本KFC 2016年便实行一周休息3天的“限时员工”制度，迅销集团也在旗下优衣库引入了可以选择每周休息3天的制度。

看起来是个双赢的决定，员工获得了假日，而企业获得了更高的利润，但对于目前的企业和工人而言，“上四休三”仍然可

望而不可即。日本厚生劳动省201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6.9%的公司推出了一周休三天制度，这比上一年调查中的6%仅仅略微增加了0.9个百分点。

“上四休三”还有跨不过的坎。瑞典从养老部门开始的试点便足以说明这一问题，比如其他行业对这样的改革并不感兴趣，哥德堡警局发言人Sanna Gustafsson曾公开表示，如果在警察部门推行此政策，无异于孩子气的胡闹。彭博社也曾评价称，这样一种工时改革，基本不可能在白领行业推行下去。

此前一份对美国、法国、德国和英国平均工作小时数以及其经济表现的分析发现，在工作时间较少的国家，工人的人均生产率水平往往较高，但是整个国家的生产率较低。而在法国，缩短工时甚至出现过巨大的争议，1998年，法国的左翼政府便将大多数工人的每周工作时间从39个小时强制减少至35个小时，而在工会的坚持下，工人的工资水平没有改变，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失业率反而上升了。

更重要的是，法国改革派还提出了“多工作多赚钱”的口号，要求取缔限制工人工作时间的35小时工作制，这一争就是十年之久。2008年7月，一周35小时工作时间的强制规定结束，尝试以失败告终。

北京商报综合报道